

读 书 文 丛

读书杂志编辑部编

责任编辑：吴 彬

封面设计：宁成春

书 与 现 实

舒 芜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375 印张 107,000 字

1986 年 7 月第 1 版 198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002·59 定价 1.55 元

目 录

1	题 记
3	忠贞的灵魂 ——读《冯雪峰论 文集》
21	谈《榆下说书》
34	发愤的书：《炼狱中 的圣火》
47	附录一 致《读书》 编辑部函
49	附录二 见到勘误 之后 王春瑜
51	读《叶圣陶散文（甲 集）》的跋文
55	两部《方以智年谱》
60	推荐《古神话选释》

63	关于《中国近代文论 选》答客问
66	白盾作《红楼梦新 评》序
77	吴孟复作《唐宋八 大家简述》序
85	舒诤作《扫叶集》序
95	《沈祖棻创作选集》 序
104	李景彬作《周作人 评析》序
114	《论文偶记》《初月楼 古文绪论》《春觉 斋论文》校点后记
119	《饮冰室诗话》校点 后记
128	《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校点 后记
133	操蛇而舞

136	纪昀之过与徐桐之 愚
139	中国小说史的一个 ‘遗憾’
142	“合理推论”未必真 实
146	理想主义的破灭与 新生
149	迎向阔大和永恒的 诗篇 ——谈陈子昂《感 遇》诗
156	瀑布·银河·画幅
164	读郑嵎《津阳门诗》
174	附录一 致严霜 同志函
175	附录二 严霜同 志来函(摘录)
176	附录三 津阳门 诗并序
189	读《匡庐游录》

201 | 读诗小记

218 | 勘诗小记

题 记

一九七八年又有了用常用的名字发表文章的权利，我已经五十六岁了，这项权利失去二十一年了。当时定下一个专题研究的大计划，决心今后只读这方面的书，只写这方面的文章。我警告自己：有生之年能否完成这个计划很难说，务必全力以赴，切切不要再象过去那样杂乱无章了。计划执行之初，还象那么一回事，总算管住了自己，颇有点键户下帷，目不窥园的味道。不久就不行了，新鲜可喜之事每天都有，哪个方面都有，你不去管它，它跳进园来，掀开帷来找你。何况我既无园，也无帷，终日起居坐卧的只是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室，尽管我名之曰“天问楼”，实际上天是难以问到的，还是人间的消息容易传进来。这就引得我逐渐恢复了胡乱读书、夹杂作文的坏习惯。现在就把这些年来写的从读书而来的文章，加上很少几篇过去写的（即三篇校点后记，一篇读纪德的

小说的随笔，一篇读《津阳门诗》的笔记），编为一集，形式上可以分为书评、序跋、读书笔记，其实无非读原稿、读新出版的书、读久已出版的书之分，其为读书则一。编成目录一看，实在杂乱得一塌糊涂，毫无条理可言；而原来计划要专攻的书，却是一本也没有，干脆被挤掉了。这当然是不成名堂的。勉强可以解嘲的只能姑且这么说：读书不忘现实，读书的兴趣反映了对现实的兴趣，现实的波澜壮阔，日新月异，对于学有专长者会激励他更加努力从事专门的研究，对于我这样学业本无所专的人，便以难于抵抗的诱惑力，引得我读书的兴趣专一不下去了。这并不是说我是带着问题读，活读活用，急用先读，只是说我对什么书感兴趣，越来越随着破门而入的新的现实为转移。这样读书产生出来的书评、序跋、读书笔记之类，当然谈不上学术的理论的价值，如果说里面还有些现实感，正在现实生活里工作着斗争着的广大读者还看得下去，那我就很满足了。所以我把这本小书题为《书与现实》，表示我的希望。一九八四年十月八日，于北京天问楼。

忠贞的灵魂

——读《冯雪峰论文集》

风流云散后凋松，昨岁新正哭雪峰；
残稿未成天国史，遗骸谁覆党旗红？
平生交谊师兼友，一夕谈谐始亦终。
闻道百花重烂漫，灵山绝唱奠英雄。

一九七七年哭雪峰同志

三大本的《冯雪峰论文集》，是不太好读的。三十多(三十二)年，近两百(一百九十一)篇，近百万(九十八万四千)字，这几个数字就够重的了。而这近百万字，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传播、扎根、成长的历史，纪录了这个过程中一位探索者的行程，二者都是漫长而曲折的。雪峰同志的文字，又素有“晦涩”之称，虽然也未必尽然，晚年之作更是日趋平易，但总的说来，他写文章是同读者一道思考，而不是思考出结果来告诉读者，所以读起来总归是吃力的了。《读

书，杂志要我读读这部不太好读的书，写点读后感。我倒是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关于雪峰同志，我是应该写点什么的了。

雪峰同志，是我青年时期所尊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高举鲁迅旗帜的英勇旗手。解放以后，他是我工作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同志。（他是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创建的。他在这个单位的领导岗位上，以平等精神和朴素作风得到普遍的敬爱；纵使他被错划为“右派”以后，这个单位里的多数群众也仍然在默默中对他保持着这种敬爱。）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和他都以“留用右派”的身份，就在他负责创建和领导的这个单位的同一间办公室里朝夕相聚者三年。十年浩劫中，我和他又作为同一单位里的“牛鬼蛇神”，同住一个“牛棚”，同下一个文化部“五七”干校，同在一个连队。后来我们先后回到北京，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校对，他的编制也仍属人民文学出版社，却没有再上班，我们才不常相见。一九七六年初他逝世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刚逝世不久，解放了将近三十年的中国，却处在又一个黎明前最寒冷的时期；当时也算是给雪峰同志开了一个不成体统的追悼会，姚文元下令不得致悼词，参加人数不得超

过二百人：国家和个人所遇到的事，都是十分离奇，而又十分现实。这样的時候，我没有话可说。于无声处，只有雪峰同志的骨灰盒上，由他的子女题了这样三行字：“诗人。作家。毕生信仰共产主义。”看到的人都体会到它的分量。这年十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雪峰同志已经看不见了。次年春，我次友人韵作了《丁巳春感五首》，正好第三首有“峰”字韵，我即以这首来追哭雪峰同志，如本文前面所引。其时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在这组诗的第一首里写我当时的感受是：“朱门柳影转青春，九陌轻寒尚袭人。”雪峰同志的身份还是“摘帽右派”，所以我有“遗骸谁覆党旗红”之句。这首诗当时只在三五友人中随便看看。直到一九七九年正式举行盛大的雪峰同志追悼会，我才请人抄了送到追悼会场去。使我不免敝帚自珍的是，我还想不出比“风流云散后凋松”更好的形象来表达我对雪峰同志的敬仰。但考虑到雪峰同志的党籍已经恢复，而诗中还有“谁覆党旗红”云云，便特地在诗题上标明“一九七七年”字样，希望不引起误会。我也自问：为什么只抄旧作？为什么不能根据新的情况，畅所欲言地写点新的东西呢？我发现，已经不再是有什麼外力阻

止我，而是自己所欲言的，自己还想不清。而这想不清的东西，又清楚地凝现为一位老人的背影。

所谓文化部“五七”干校，是在湖北咸宁的斧头湖边搞围湖造田。那里多雨，土质是红胶泥，军宣队提的口号是“小雨小干，大雨大干”，所以比什么艰苦的劳动都更令人头痛的，是在每次冒雨出工的路上。经雨的红胶泥，下步时滑得把不住，提步时又粘得提不起，没走几步，鞋底已经粘成几斤重的大泥团，甩也甩不掉了。“滚一身泥巴”，真正成为常见的情形。平时出工要按班排列队行进，这时队形实在维持不住，班排长们也只好睁眼闭眼过去。我腿脚素来笨拙，狼狈相自然不必说。有几次偶然走在雪峰同志后面，发现他却是走得非常矫健，灵活而又稳重的步法，随时能从倾侧之中掌握好平衡，决不用担心他会摔倒。我想，他已经快七十岁，比我大二十岁，前几年还动过胃切除的手术。他走得这样好，我为什么不能稍微学一点呢？但这样一想之中，我又踉跄了几步，表演了几个狼狈相了。从此我就愧随雪峰同志之后，每当冒雨出工，我总是力避走在他的背后。然而，泥泞滑溜胶粘坎坷的路上，一位瘦劲的老人，肩上一把铁锹，迈着灵活矫健的稳步前进的背影，却是躲不开

的，它总是在我眼前鲜明地出现。我总觉得，这不仅是在雪峰同志走在咸宁斧头湖边冒雨出工路上的形象，而且是他一九五七年以后的一生最后二十年的人生道路上整个的形象。是不是这样呢？为什么是这样呢？这就是我总没有想得清的。现在正好有机会系统地读一读雪峰同志的理论文章，看看能不能把问题弄清楚一点。

开卷果然有益。

雪峰同志的战斗的一生中，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宣传、阐释、捍卫、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常常是同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上一些重大的尖端性问题密切相关的。现在这三大本论文集，就集中了全部资料。如果据此进行研究，探讨其中的规律，分析其中的得失，那将会是大有益的。可惜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得到一些零星的体会。

雪峰同志的一些精辟论断，曾经在文艺的几个根本问题上给我深深的启发。例如，关于文艺规律，他说过：“所谓文艺的规律，其实就是创造人物的规律，也就是生活和生活斗争的规律。”（论文集下册 195 页）关于文艺真实，他说过：“文艺不能不是肉身的东西。……一定浸满着作者的战斗的

血痕，才能证明那是真实，而给予理想与实践的力量。”（上册306页）关于文艺批评，他说过：“具体的文艺批评首先就是生活的批评，社会的批评，思想的批评。”（中册98页）总之就是要从生活，要从社会的、作品中的、作家自己的有血有肉的生活，来观察和处理文艺的一切问题。这样的文艺思想，曾经帮助我努力从根本上看文艺，而对那一切形形色色的脱离生活的、机械冷淡的、玩弄技巧的文艺观，从心底里感到格格不入。

作为雪峰同志领导之下的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编辑人员，我曾经从雪峰同志的一些有关言论中，找到过明确的工作指针。例如，一九五三年，雪峰同志就指出：从《诗经》起，经过屈原、司马迁、杜甫、施耐庵、曹雪芹，直到鲁迅，形成一条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长河（下册24页）。那是在解放初期，在社会上还很有些人怀疑“共产党要不要封建时期的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这些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编辑工作的人信心也不太足的时候，一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出来说这句话，其影响之大，现在的读者怕是难于想象的。雪峰同志还说过：对遗产的批判，就是通过具体的分析和综合性的总结，达到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新

看法，达到对遗产的看法上的革新；至于“对于遗产本身，本来并无所谓革新，例如我们就不能修改古书”（中册518页）。这对于解放初期的中国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工作，更是直接有用的提示。当时，弄不清我们出版古典作品是否应该学太平天国删改《四书》《五经》的榜样，这种糊涂观念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对古典作家的思想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常常苦于究竟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不大好区别。这时，我们从雪峰同志的论文中得到一个深刻而又简明的公式。他说：古典作家的成体系的思想，往往是封建的；而他们同情人民疾苦、痛恨黑暗政治和残酷剥削的思想倾向，则是有人民性的（下册141—143页）。这个公式曾经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纠缠不清的问题。

重温如上所引的雪峰同志的这些言论，回忆当时的情形，都有一种亲切之感。而另外一些言论，当时没有特别注意，现在看来才知道是真知灼见，不是泛泛之谈。早在一九五三年，雪峰同志就着重阐明英雄和群众的关系，批判文艺创作中孤立英雄、突出英雄、轻视群众、压低群众的倾向（下册52—53页，69—70页）。他大声疾呼：“群众什么时候都是实际生活中矛盾斗争的主体，而决不是

旁观者或两种力量之间的中介物。”他又说：“英雄是群众的一分子，只有在群众身上所能有的东西，才能在英雄身上出现，或者先出现。这就是我们所要创造的新人物的形象，他们新的崇高的性格和品质都应该是带群众性的、能够感动一切普通人民群众的、普通人民群众都感到亲切、都愿意仿效并且能够仿效的理由。”（下册70页）经过十年浩劫百卉凋零之后，经过什么“三突出，三陪衬”的谬论的残酷统治之后，再来看这些话，说得是多么好啊！即使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恐怕也是有益的箴言。

我并不认为雪峰同志的理论没有错误。他在一九三〇年就宣称“中国的统治阶级已到它底崩溃的末日，而无产阶级底力量却长大到可以掌握政权了；世界各国也是如此”（上册22页）。这恐怕是当时正居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的声音吧！到了一九五五年，他又说：尽管中国革命已经胜利，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但较之二十年前瞿秋白同志牺牲的年代，“在新的情势之下，阶级斗争不仅不会稍微缓和，反而更加尖锐、更加深刻和更加复杂。”（下册331页）这恐怕又是新的左倾错误的苗头的反映吧！这些错误，当时

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觉察，能够不跟着说，而今天，说它们错误却是很容易的。

对于作家和作品，雪峰同志的褒贬抑扬也并不总是正确的。毕生高举鲁迅旗帜的雪峰同志，在一九二八年第一次论及鲁迅时，竟然说鲁迅“在艺术上是一个冷酷的感伤主义者”，在政治上“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在批评上，对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在旁边的说话者。”（上册6页）这个显然错误的评价，当时使鲁迅很不快，这已是文学史上人所共知的故事了。对于丁玲同志的《莎菲女士日记》等作品，雪峰同志起初也是错误地给以完全否定。

但是，雪峰同志是能够修正错误的，是能够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辩证的过程中成长的。他后来对鲁迅的研究和阐发，彻底纠正了他自己最初的错误，其成绩照我看来，至今还是未被超过的，例子太多，索性不举了。现在只看看他前后两次怎样评价《莎菲女士日记》等作品的。第一次，雪峰同志宣布：《莎菲女士日记》等作品中，只有“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pe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写这些作品的作家乃是“思想上领有着坏的倾向的